

天空,受伤了,呈现一片含糊不清的灰黑色。邈邈的云朵,像是扯烂了的旧棉絮,东一块,西一团,有气无力地挂在岌岌可危的天幕上。邻国印度尼西亚“烧芭”(注)所引起的林火,使新加坡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烟霾灾害。

我吸进肺里的每一口气,都沉甸甸地裹着脏兮兮的灰烬,呼吸道严重淤塞,十分辛苦。去看医生,回家时,在大门口碰到刚刚下班的儿子。

看到脸如死灰的我,他问明原委,一声不响又驾车出去了。少顷,捧着一个大大的空气净化器回来,手脚麻利地安置在我卧房里,说:“妈妈,今晚你一定能够睡得舒舒服服的。”我服了药,昏昏沉沉,倒头便睡。半夜醒来,看到一个硕长的黑影蹲在床边,吓了一大跳。仔细再看,原来是儿子。他轻声说道:“我来检查空气净化器操作得顺不顺。”

在这一刻,我的心弦,很温柔地被牵动了。那一年,日胜远赴沙特阿拉伯工作,我偕同两岁的儿子同去大漠生活。就在这个风沙迷蒙的地方,他患上了哮喘病。

每回病发,他便好像是被滔天巨浪冲上岸的一尾鱼,暴突的眼珠仿佛随时会脱离眼眶飞弹出来。痛苦地张着的嘴巴,像一个绝望的黑洞;肺部呢,则是损坏的抽风机,嘶嘶作响。我十万火急地抱着他赶往医院。初到大漠的他,胖嘟嘟的,抱在怀里,很沉、很重;他喘,我也喘。在高达40℃近乎燃烧的天气里赶抵医院时,飙出的汗,化成了背上的一层浆糊,母子俩的脸,都白得像鱼腹。他在氧气罩里吸足了氧气而缓过气来时,我却瘫坐一边,骨头散散垮垮的,撑不起一身的重量。

最糟的是夜半发病,在夜色里,手忙脚乱地扑向医院。经过治疗后,他安稳地睡去了,我却不敢掉以轻心,在病榻旁一直守到天色泛白,见他无事了,才勉强合眼小睡一会儿。在大漠里,无数个夜晚,我的睡眠,就这样被他的哮喘病捅得像一张渔网,满是网眼。

原本打算在大漠住上三年,但是,他三天两头发病,身子好似被扎了一个孔的气球,扁得像张纸。终于,医生劝我搬离大漠。

千山万水地飞回家,他的哮喘病却未能断根。西医治不了,我便四出寻求偏方,什么蝙蝠干、鳄鱼肉,全都买来给他炖汤喝,焦虑得连蓬蓬勃勃的头发也萎萎焉焉地憔悴了。有时,他闹脾气,不肯喝那有着些许怪味的汤,我便耐着性子,给他讲故事,陪他看电视,一小匙一小匙地喂他。一碗汤,拖拖拉拉地喝上一个多小时,对于“分秒必争”的我来说,这样子挥霍时间,是近乎“奢侈”的。

到了五六岁时,他哮喘病发作,我已抱不动他,只能背他。他断断续续好似随时会画上句号的呼吸声落在耳里,像揪心的雷声,我步履沉重地走着,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他察觉了,便语不成调地说:“妈……妈,你……不要……不要哭……”

终于,无比艰难地、一寸一寸地把他拉拔成人。爱,是瓜也是豆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成长了的孩子,总想方设法把鬓已斑白的妈妈妥妥帖帖地照顾好。

(注:“烧芭”是印度尼西亚农民昔日惯于使用的农耕方式,他们放火把郁葱的热带雨林烧成“空地”,之后,用以从事耕种;余下的灰烬,则充作天然肥料,一举两得。“烧芭”的耕作方式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然而,由于成本低廉,依然被广泛使用。)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周末,时任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的罗文如同往常一样出现在南市老城厢一带的旧书摊前。闲暇之余走街串巷,穿梭于各家旧书摊“淘宝”乃罗文的一大喜好,尤其是从事档案工作以后,为了寻访散佚民间的档案资料,他对古旧书刊的兴趣日渐浓厚。

那日,他在一书摊跟前驻足,饶有兴致地翻阅起旧书来。忽然,一本薄薄的、比32开还稍小一点的平装本引起了罗文的注意。

由于岁月侵蚀,小册子的红色封面已发黄变脆,显得斑斑驳驳,但上面的图文仍可辨识。其正中是一幅着大络腮胡的西洋男子肖像,罗文一眼就认出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像的上下两端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

“这莫非就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罗文的心怦怦直跳。

为验证自己的猜测,他急忙翻开小册子末尾的版权页,两行竖排的铅印字证实了他的判断:“一千九百二

去年十一前后,我回到美国家里,遇到我家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红院长。她问我,2016年2月他们会举办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请不同的专家来讲解中国的戏曲艺术。“你能给大家讲讲吗?”我立刻回答:“好啊!我可以讲中国戏曲和西洋歌剧的不同。”

于是,回北京以后我翻出各种材料,捧着英汉和汉英两大辞典,查询了很多有关京剧的专有词汇,做好了准备。今年2月,我又从北京来到了美国,带着图片、视频还有文字的资料,登上了飞机。

奥克拉何马的讲座时间安排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十五分,这个时间正好是中午的饭点。这恰恰体现的是一种西方式的文化

午餐讲堂

吴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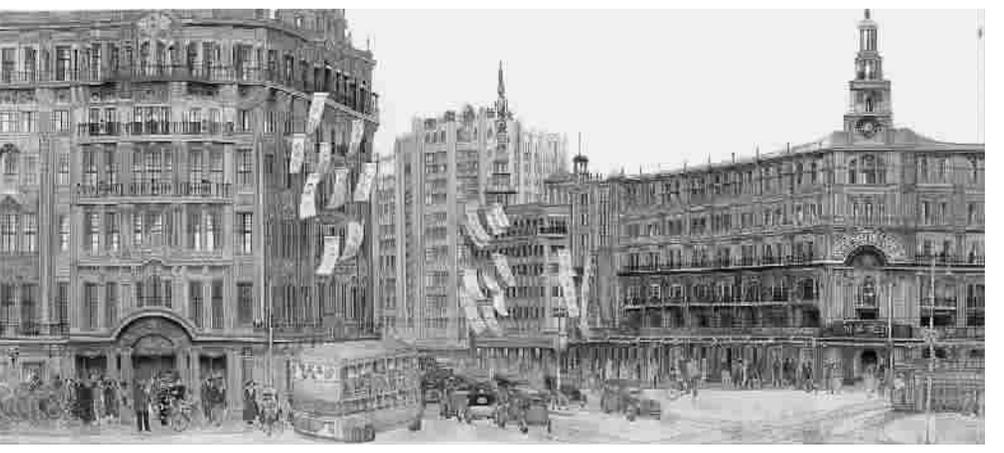
思维。学红老师跟我商量时间的时候就说,本来这个时间是安排给一位国内来的教授,他听说是中饭时间,下面的听者一边吃饭一边听课,便感觉十分不爽,他觉得这样的讲课和听课对他不够尊重。表示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段讲课。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美国的我则完全没有觉得不开心。西方许多严肃正规的讲座、商谈都会安排在吃饭时间,有早餐会见,有中晚餐会议和演讲,早已成为一种大众接受的工作习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解释是,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如果把进餐和吸

收知识相结合,甚至和创造利益相结合难道不是一举多得么?

那位认为对他不够尊重的专家其实是有些观念落伍。我对学红院长说,没问题,把中饭时间给我,我不在乎讲课的时候有人吃饭的。

那天,整个礼堂大概有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一百多位听众围坐圆桌旁,桌子上摆着餐具,人们面前有沙拉和其他食物。教室前方是正式讲堂必备的设施,讲坛、电脑、麦克风和—个很大的白色频幕。

我用英文开始演讲,



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 (纸本水墨) 毛冬华

赏花

刘敏

说到赏花,当年在北方,对花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花色少且花期短,短到你来不及注意她们。就是到了南方,也从没去追踪花期。有一年春天,朋友约到一家园林别墅去见面。一进去我便惊住了,只见满园各色花开得凶猛。坐在客厅,窗外只见花色不见天空。中间一棵大树,没有一片绿叶,只有大团的花朵。树下是绿草地,一些被风摇下来的花瓣铺在上面,绿深红透。我在树下转了好几圈,竟有些不舍。由此想到,可能错过了江南最重要的景色。江南有古巷,有春雨,有佳人,有软语,有弹词,有小船,还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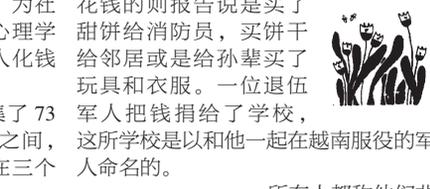
而这梅花,倒是第一次观赏。梅花不比腊梅,腊梅开几株就可品,一嗅清心,再嗅微醉。而梅花就是要多,一起开放。有红有白有粉,俏不争春只争色。腊梅只有一种淡黄,花蕊和花瓣几乎连在一起,不明显。自古以来,咏梅之词甚多。我也想赞美,那就来一句吧:这是好花,真美。

有研究证明,当人为别人、为社会作贡献时心情会感到愉快,心理学家们现正致力于研究人们为别人花钱是否会有益于自身的健康。

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召集了73名高血压患者,年龄65-85岁之间,每人得到120加元,要求他们在三个星期内分三次用。被测试者每星期都会得到一个药瓶,瓶盖是特制的,会记录开瓶的日期和时间,瓶内有两张20元的加币和一张纸条,指示被测试者当如何用这笔钱。有些人总是被告知要为自己花钱,另一些人则被要求为别人花钱。

为自己花钱的人大都说了毛衣,去做了按摩或者是买票参加印度佛教的研讨会。有一个女人买了面霜,据说还有奇迹般的效应。而那些为别人

花钱的则报告说是买了甜饼给消防员,买饼干给邻居或是给孙辈买了玩具和衣服。一位退伍军人把钱捐给了学校,这所学校是以和他一起在越南服役的军人命名的。



慷慨和康健

周炳扬

所有人都称他们非常乐意获得瓶子里的钱。研究人员用一种自动装置测得每个人的血压,对比后发现那些为自己花钱的人血压没有变化,而为别人花费的人的血压显著下降。使研究人员吃惊的是,血压下降的幅度和医生指导病人有规律地参加有氧运动下降的幅度是一致的。

研究小组的下一个目标是扩大取样的范围,他们借助一项叫“中年”的研究项目的数据库,挑选了186位55-84岁的高血压病人展开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列出每个月为朋友、家庭、慈善机构和其他人化了多少钱,两年以后,被调查者回访美国各地的研究中心测量血压。结果为别人花钱较多者的血压较两年前为低。当然,这项调查会因对象的收入多少、身体好坏和婚姻状况的不同而有一定的误差,但无论如何,数据告诉我们:慷慨者的血压较低。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有专家认为:帮助别人可以对日常生活的紧张起到缓冲作用。最近甚至有研究报告说:即使是简单地给朋友写一个表示支持的纸条也会有助于稳定血压。当然,是否要把慷慨或乐善好施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手段,还需要作更多的研究。

十八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就是它!罗文在旧书摊上发现的正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国内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1848年2月在伦敦正式发表。自19世纪末,《宣言》通过一些零星片断式的摘译被介绍到国内,但一直未有通篇全译。1919年底,这一重任落到了刚从东瀛归国不久的陈望道的肩上。他受《星期评论》编辑部的邀约,在家乡义乌潜心翻译。陈望道主要依据《宣言》日文版,并参照英文版,于1920年三四月间完成译稿。

正当陈望道携稿赴沪之时,《星期评论》被军阀当局勒令停刊。失望之余,他找到了昔日的学生俞秀松,托其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拿到译稿,陈独秀赶忙请来李汉俊一同校读。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读来畅快

淋漓。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陈、李二人拍案叫绝,当即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单行本。怎奈他们囊中羞涩,这笔经费无从着落。幸而,此时在沪与陈独秀讨论建党问题的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得知此事,欣然允诺给予资助。于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开

办又新印刷所,承印《宣言》。当年8月,几经磨砺的《宣言》中译本第一版终于付梓,共计印制1000册。全书56页,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和序言,也不设目录,风格简洁。或因时间仓促,第一版在校排时出现的讹字、漏字达25处,尤其是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竟错印成《共产党宣言》。好在,又新印刷所闻过即改,马上纠正了初版在书名等处的谬误,于9月又加印1000册,并将封面颜色改为蓝色,以示区别。

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

诞生于中共建党之前的《宣言》首版全译本到解放后已难觅踪影。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意外的收获令罗文激动万分。他花5角钱买下这本弥足珍贵的红封皮小册子后,小心翼翼地掸了掸封面上的灰尘,又向摊主要了张旧报纸,轻轻地把它包裹起来,带回家。

然而,罗文并没有把这一稀世珍宝据为己有,而是将它无偿捐赠给单位,使之成为上海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后来,馆方又征集到了蓝封面的二版《宣言》中译本。

据统计,首版《宣言》全译本今仅存7册,上海市档案馆同时藏有首版与二版《宣言》全译本,堪称独家。2003年,经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市档案馆和浙江省上虞市档案馆联合申报,《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人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十日谈

档案文献遗产

黑胶唱片让后人永远铭记抗日救亡的那段峥嵘岁月,请看日本栏。